

正确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证

——读张闻天《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了解具体情况》

□ 王凤青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切实提高共产党人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1940年3月，张闻天在《共产党人》杂志第4期发表了《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了解具体情况》一文。该文认为各地党部要正确执行党中央的政治路线，需要正确了解各地的具体情况，并指出了了解具体情况的办法，对于纠正当时党内存在的不注重了解具体情况

了解具体情况至关重要

张闻天指出，正确了解具体情况是正确制定具体任务的出发点，也是具体任务得以实行的基础。“不论是党中央也好，或是地方党部也好，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去正确地了解具体情况，是它们正确地决定具体任务的出发点，也是它们使这些具体任务能够实行的基础。”“没有对于具体情况

的正确了解，我们或是不能行动，或是行动而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认为在中国，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战争的环境，不但省与省间的具体情况不相同，而且在一省之内，甚至一县之内，具体情况也不完全相同，因此“对于当前具体情况的了解，尤为重要”。张闻天认为，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根据对中国当时具体情况

的正确了解，来制定出来的全党的具体任务，是党的正确的行动方针与奋斗目标。它在制定出来后，需要各地党部去具体负责落实，但是，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只能给各地党部以一般的行动方向，它要在各地实行起来，需要各地党部“根据中央的政治路线来具体分析各地当前的具体情况，再根据对于各地当前具体情况的了解，来决定各地党部的具体任务”。张闻天认为，这一过程是“中央总的政治路线在各地的具体化”，“也就是马列主义在各地的具体运用”。

为了使党员干部真正认识到了了解具体情况的重要性，张闻天分析了不了解情况给党的工作带来的巨大干扰。第一，在工作中“碰钉子”，或是工作“做不通”。他指出，“碰钉子”或“做不通”工作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对于当前具体情况不了解或了解得不正确”，正确了解了当前的具体情况，钉子就可不碰，事情就可做得通。第二，对某一问题发生争论。他认为原因还是“各人对于具体情况不了解或了解不正确”，大家只要正确了

核心阅读

1940年3月，张闻天发表的《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了解具体情况》一文是抗战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文献之一。该文提出各地党部要正确执行党中央的政治路线，首先需要正确了解各地的具体情况，并指出了了解具体情况

解了当前的具体情况，各种意见就会趋于一致，争论就可得到正确的解决。第三，在工作中找不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具体办法。在他看来，原因“主要也是我们不能了解当前的具体情况”，“只要真能透彻地了解当前的具体情况，办法也就会有”。

什么叫“了解具体情况”

张闻天不但指出了了解具体情况至关重要，还对什么叫“了解具体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所谓“了解具体情况”，就是“认识现实，认识现实各方面的运动的规律”，就是“根据对于现实各方面运动的规律的正确把握，来改造现实，使之走向共产主义的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客观与主观、现实与理想的统一”。

张闻天分析了不了解具体情况

张闻天还强调指出，“只有根据于客观的主观，只有根据于现实的理想，只有根据于具体情况的工作计划，才能战胜一切障碍物，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他看来，这也是我们党“所以有力量、所以生气勃勃、所以必

然要胜利的根据”。在这一方面，他是有深刻体会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他深感自己对中国实际情况缺乏深入的、具体的了解，为了补上这一课，在1942年初到1943年3月初，经中共中央同意，他从中央抽调了9名干部组成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到陕北和晋西北农村城镇进行了一年零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全面了解了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思想状况以及风土人情，为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支撑。

如何正确了解具体情况

对于如何正确了解具体情况，张闻天在文章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他认为“了解具体情况，也就是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是运用马列主义于具体环境中，同时也是发展马列主义”。

张闻天认为，要了解具体情况，必须从两方面入手。第一，要“常常注意于各种具体材料（不论是口头的或文字的、物质的或精神的、现在的或过去的、实际经验的或抽象原则的、历史的或论理的、正面的或反面的材料）的搜集”。第二，具体分析搜集到的材料，从中找出有规律性的认识。张闻天指出，了解具体情况不等于诸多材料的堆积与描写，必须依靠马列主义的理论去分析与研究具体材料，从具体材料中去把握现实的一定规律，“再根据这些规律来定出自己的具体任务”。他还认为，在了解具体情况的过程中，必须培养两种精神，第一，要有不怕麻烦、不怕琐碎、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要到各处去访问，

要多找人谈话，要多看材料，要多检查工作，多注意实际经验”。第二，“有打破一切成见、一切陈腐的公式的勇气”，有马列主义的创造的、批判的精神。“要多研究、多考虑、多倾听人家的意见，多同人家交换意见，要反复思维。”

为了使全党上下学会正确了解具体情况，张闻天严肃批评了党内与正确了解具体情况格格不入的现象。他尖锐地指出，党内有很大一个弱点，很多同志善于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善于背诵上级党部的决议，善于根据自己主观的愿望提出包罗万象的工作计划，善于纵谈自己经过的许多历史事实，善于夸张自己丰富的实际经验，“然而对于认真地去了解具体情况，认真地去收集具体材料，认真地去分析与研究这些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得出一定的结论，则表示不愿意，表示轻视或表示完全无能”。他指出这是“党的政治路线停留在口头上、纸头上而不能具体实现的主要原因”，是“党的经验停留在原地而不能向前发展的主要原因”。

张闻天要求，“必须把克服党的这个弱点当作党内的一个重大任务”，主张“使理论与实际统一起来，使没有实际的同志多同实际接触，多去研究实际”，进而使全党有更多的同志真能在各种环境中正确地了解具体情况，再根据具体情况来提出具体任务，并为这些任务的完全实现而奋斗。当然，具体情况非常复杂，本身也是变化的、发展的。张闻天对此也非常清楚，他指出，“具体情况决不能一次被了解清楚”，“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进一步进一步的了解”，要求党员干部“要在实践中把握现实各方面运动的规律”，“要根据于这些运动的规律来指导我们的实践”，“要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来完成我们党的历史使命”。

张闻天的这篇文章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认识运用到了对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对于纠正当时党内存在的不愿了解具体情况的错误倾向，提高共产党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工作作风和学风，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坚强战斗力的执政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感悟陈云的好文风

□ 王 鹏



陈云同志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著作，主要收录在《陈云文选》和《陈云文集》中。这些著作，都是他亲自动手起草的，深刻透彻、言简意赅、条分缕析、幽默风趣，体现了短、实、新的好文风和治学之道。

深刻犀利。陈云一贯主张“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他的讲话、文章也是如此，立足实事求是、解决问题，高屋建瓴、透彻深刻。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仍在中央领导集体中担负重要责任的老一辈革命家，他敏锐地看到干部队伍不适应四化建设、必须注意培养接班人问题，亲自向中央写出多篇报告，大声疾呼，“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并耐心地说服老同志“自觉地、认真地、正确地选拔接班人，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培养他们”；当年轻一代的领导人走上岗位

后，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身负重任后要注意学习哲学，“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当他看到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党内、腐败现象蔓延时，旗帜鲜明地作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两个文明要一起抓”等著名论断。这些谈话、讲话和文章，看问题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讲对策立意深远、一语中的，充分展示了一位老革命家的高瞻远瞩和宽阔视野。

言简意赅。陈云的讲话和文稿，从来都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没有一句空话、套话、废话。1977年3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的书面发言，只有五段话200多字，直接点出了粉碎“四人帮”后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解决的两件大事：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让邓小平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1987年10月19

日，他在中央纪委第九次会议上的书面讲话，只有两段话，连标点符号加在一起只有111个字，是迄今为止中央、纪委主要领导在全会上的最短讲话。但这短短的两句话中，却作出了两个重大判断、说明了一个重大历史问题：第一，“中央纪委和下级纪检机关成立以来，成绩是主要的，也存在不足，需要改进”。第二，“端正党风的关键是提高党员素质，尤其是提高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素质”。第三，他和邓小平、李先念早在1986年10月就已经共同商定，为了党的事业需要，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1990年1月24日，他在同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时，握住省军区政委的手说，“军队非常、非常重要。对于党的指示，军队一定要坚决执行”。一连用三个“非常”，寄托了老革命家对人民军队的无限信任和殷切希望。这些发言、讲话、谈话，虽然朴实无华，但可谓字字千钧，道出的是党和人民心声，发出的是时代最强音，对党的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条分缕析。陈云常年从事组织人事、财政经济工作，这些工作都与入、财、物直接相关，要求工作作风实事求是、严谨规范，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到他的文风，无论是书面报告还是即席讲话，都逻辑清晰、层次分明、言之有据。1978年12月10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时讲了《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每条意见都用事实和数据来支撑，让听众口服心服。1979年3月8日，他写的《计划与市场问题》，用提纲的形式，阐释了我国计划与市场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运行中的6个重大问题，让人看起来一目了然、眉清目秀。1983年8月9日，他在关于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谈话中，从六个方面全面阐释了我军取得辽沈战役胜利的原因，层层递进、准确客观。陈云还善于进行归纳提炼，比如：“干部政策，十二个字：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对，第四，爱护人。”如何做到实事求是，“概括为六个字，就是：交换、比较、反复”。文风反映思想作风，这些逻辑严谨、条理清晰的语言文字背后，体现的正是陈云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严谨求实的学风。

尖锐辛辣。陈云的许多文章虽然都是严肃重要的政论、讲话、报告等，但是并不死板，甚至不乏尖锐辛辣。1935年6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陈云，受党委派去莫斯科向共产



选人用人工作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但难点在于如何落实对“德”的考评。就目前来看，国内关于党政干部品德测评的研究以理论研究为主，指标千差万别，缺乏量化的指标体系。萧鸣政教授的《党政干部品德测评方法研究》，是目前我国以实验研究方法深入探索干部品德测评的第一部专著，重点解决了“测什么”与“如何测”这两个关键问题。

首先，干部的品德要不要测评。从规章制度上讲，“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一项原则。但对“德”的要求并不仅仅是选拔一个“好人”，更在于遴选出

一个品德好的“能人”。作者指出，品德是党政干部素质结构中的核心与关键部分，对党政干部的其他素质具有决定性和导向性作用，它不仅是党政干部能力结构的基础，还制约党政干部能力的发展和发挥。其次，干部的品德能不能测评。选官制度中的品德测评，古已有之。两汉之察举，魏晋之九品中正，均以选拔对象的品行作为重要参考。这种选拔机制之所以在后

期流于形式，正是因为“德”这个标准具有隐蔽性和模糊性，既难以保证被测试者是否诚实，又难以保证测试者是否公正。尽管现代社会有了主流技术，但“人心”终归是难以捉摸的，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党政干部的品德，作为一种意识本身具有客观性，可以被认识并量化。本书通过实验为科学选人用人提供了促进性品德测评方法与考核性品德测评方法，对“能不能测”的问题予以了回答。再次，干部的品德测评什么。作者将党政干部品德测评标准体系归纳为政治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与个人品德五个方面。其中，个人品德是基础，政治品德是关键，职业道德是核心。本书以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国有企业的6000多位干部为研究样本，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与多元统计等方法，对相关指标体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基本形成了这五个方面18项品德测评指标体系。

为政之要 唯在得人

《党政干部品德测评方法研究》评介

□ 刘维杰



最后，干部的品德如何测评。从理论上廓清了品德测评在选人用人制度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后，如何在实践中科学把握测评标准，成为检验干部品德测评指标体系客观性和有效性的关键。较常见的测评方法如评分法等评语法、操行评定法和问卷调查法等，不仅费时费力，有的还带有主观性，甚至流于形式、表功不谤过。而本书基于所建立的18项品德测评指标体系，参考作者早年提出的OSL与FRC两种测评模式，建构了应用于党政干部的考核性与促进性品德测评方法，对于干部的品德与领导力、组织绩效、工作绩效以及领导效能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量化与实证研究。通过在江西德兴等六地的实验，该测评方法得到当地组织部门的认可，部分成果也应用到干部管理工作中，可谓理论研究与实践检验互印印证。

干部选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科学品德测评的人才选拔，测评标准越详细，评判人才的尺度就越明晰。因此，本书提出的品德测评方法对我国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考评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幽默风趣。陈云在讲话和文章中，还善于打比方、作比喻，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讲明白复杂的问题。解放战争时期，陈云担任东北局副书记兼南满分局书记，指挥了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当时，为了说服南满的同志坚持南满的斗争、保住南满根据地，他形象地解释道，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就像一头野牛，牛头在北满，牛尾在南满，我们只有在南满拖住牛尾，才能减轻北满的压力。当时，在异常危险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他在致中央与东北局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还不忘幽默地写道，准备让四纵“在安奉路两侧‘大闹天宫’，消灭弱敌，调动敌人，支持地方”。“利用与保持南满有利的环境与阵地，北满只给以几千新兵的支持，使其达到阻抑敌兵北进的效果，我以为这是十分‘价廉物美’的。”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陈云同志还特别注意提醒领导干部要注意思考战略性问题，他多次形象地比喻道：“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烟袋的人，他们是专门考虑战略问题的。”因此，我们也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这些语言，形象生动，让人一听就懂，一想就是。

